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郝大鹏 刘文瑾

「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提振微观主体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论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会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上，即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做大蛋糕”，还有助于“分好蛋糕”；然而，由于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加剧行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企业间收入分配会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利影响。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收入分配阶段的细化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技能水平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大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更为显著。论文的研究结论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共同富裕；劳动技能水平；融资约束；企业规模

「中图分类号」F49；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812(2024)12-0067-14

DOI:10.16127/j.cnki.issn1003-1812.2024.12.006

一、引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其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长期发展目标。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状态，共同富裕指的是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美好的生活(刘培林等，2021)，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总体富裕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李实、朱梦冰，2022)。

从时间上看，数字经济兴起的浪潮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任务高度重合。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并且数据要素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生产要素。2022年3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第五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变革的主导力量，企业发展深受数字化的影响，根据

作者简介：郝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刘文瑾（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5QQJH48）、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编号：DF2023YS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融摩擦异质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基于投入产出网络结构模型（编号：72403248）”的阶段性成果。

Gartner的数据,截至2022年全球至少有89%的公司采取了数字优先的业务战略。在我国,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提振竞争力的有力抓手和关键动能,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转型加快的大环境下,“数字技术+”成为企业的首要战略行为(杨德明、刘泳文,2018)。而与此同时,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参与主体,企业在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进程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理论界从宏观视角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增长、收入均衡的关系,但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已有文献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引入数字技术、推动生产经营管理流程再塑,并进一步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变革过程(Ebert & Duarte, 2018)。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增长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变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胡青(2020)通过问卷调查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吴非等(2021)利用2007—201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有学者认为,存在企业因数字化发展节奏过快或战略方向错位,从而导致成本上升和绩效降低的情况(孙继国、许玉兰,2023)。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缩小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差距(方明月等,2022);但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赋能将会导致更多失业(Acemoglu & Restrepo, 2019),而企业高管却可以凭借权力攫取更高的租金分成份额(徐朝辉、王满四,2022),这对收入公平分配无疑是不利的。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现倒U型,在发展初期,管理层会获得更高的薪酬溢价,而在跨越某一时点之后,高管与员工薪酬的差值将会缩小(李树、王雨,2023)。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企业内部,以公司财务表现、员工收入份额等作为被解释变量,较少有研究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以及整体共同富裕的影响,同时对影响机制的考察也不够全面深入。因此,本文将基于2011—2020年中国深沪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影响过程中可能的传导渠道。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现有研究多以员工收入份额作为共同富裕状况的衡量指标,而本文所搭建的共同富裕框架包含企业总体富裕、企业“做大蛋糕”程度指标和“分好蛋糕”程度指标、同行业不同企业间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与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内涵更为契合。其次,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不同收入分配阶段(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影响,从而使得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此外,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与技术人才、资金投资和投入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实证检验了不同劳动力技能水平、融资约束程度和企业规模可能带来的异质性表现,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共同富裕的内涵解析

对于共同富裕的概念,《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在政策上给出了定义:“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基于这一定义，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构建了诸多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或指数模型。万海远、陈基平(2021)依据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从国民总体富裕和全体居民共同富裕两个方面提出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其中前者用人均国民收入代表，后者则由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反映。万广华等(2023)从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三方面对我国28个省市的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算，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五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陈宗胜、杨希雷(2023)紧扣“富裕”和“共享”两个关键词，搭建了一套包含2类一级指标、4类二级指标、15类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推进程度评价体系，并据此测算出2000—2019年度我国社会共同富裕程度以及与2035年目标的差距。

尽管现有指标侧重角度各异，学界也尚未就此形成统一认知，但大体上看，对共同富裕概念的拆解围绕着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展开，前者对应经济一般性增长即“做大蛋糕”，后者对应收入均衡性分配即“分好蛋糕”。对企业层面共同富裕的测度也可以遵循这一思路，即一方面是提高企业财富积累的“总体富裕性”，另一方面是实现富裕成果惠及的“公平共享性”(方明月等，2022；曾之明等，2023)。就总体富裕性而言，其主要考察角度包括宏观经济增长、公司财富积累、员工收入增长等；而就公平共享性而言，现有研究多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等企业内部指标来测度(裴璇等，2023)。考虑到部分文献指出数字时代将会产生一些具有较强垄断力的超级明星公司，进而导致市场不断集中和收入不平等加剧(Guellec & Paunov, 2017)，因而本文认为在研究公平共享性时，还应将企业间收入分配状况纳入其中，包括行业集中度、企业间收入差距等，从而使得分析更加全面、也更加契合相关政策概念。基于此，本文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解析具体如图1所示。

(二)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

1. 总体富裕维度

数字化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首先，从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数字经济使线上与线下、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实现了资源要素的高效精准匹配，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其次，数字经济具有透明的交易和评价机制，以高质量低成本的方式迎合人们的潜在需求。同时，数字经济还会衍生出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市场边界(夏杰长、刘诚，2021)。最后，作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能够克服传统要素的稀缺性和排他性，其不仅可以直接投入生产，而且可以提高传统要素如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的生产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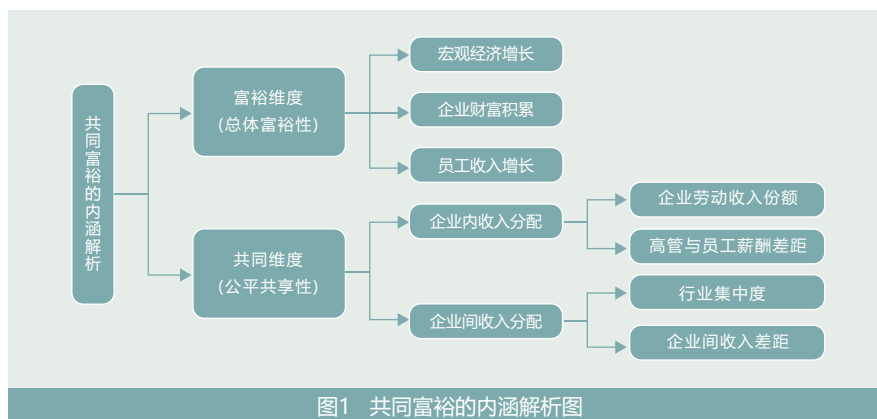


图1 共同富裕的内涵解析图

具体到微观企业主体，企业利用先进成熟的数字化技术，拓展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探索新的市场机遇，进而为企业绩效带来积极回报(胡青，2020)。同时，企业借助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改造和升级运营流程，构建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

体系和管控体系,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驱动企业盈利增长(Gölzer & Fritzsche, 2017)。此外,企业还可以利用消费者数据和生产数据来优化生产流程、缩短反应时间、提升整体营运效能(戚聿东、蔡呈伟, 2019)。

2. 公平共享维度

与总体富裕维度不同,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成果公平共享还存在意见分歧。就企业内收入分配而言,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利用效率更高的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力劳动,可能会导致部分失业现象,同时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会创造出新的就业需求,尤其是扩大企业对相关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Acemoglu & Restrepo, 2018)。此外,数字化转型的成本节约效应可能会带来产出规模扩张,这也将平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效应(孟浩、张美莎, 2021)。从企业结构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会改变企业的传统组织架构,使之趋向扁平化和网络化,组织进一步向下赋权,高管权力削减、基层权力扩张,员工对工资的议价能力得到提高,进而有助于改善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戚聿东、肖旭, 2020)。

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说,也存在两类相反方向的作用因素。一方面,同一行业内相互竞争的企业具有平行扩散的技术溢出趋势,且对于技术相似度越高的企业,纯知识外溢越明显(王晓君、付文林, 2020)。在行业数字化变革的过程中,技术外溢会均衡不同企业的市场租金,进而提高员工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徐朝辉、王满四, 2022)。但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往往也有一定的资金门槛,这会使得原先资源充裕的企业更易做出创新行动,导致行业准入门槛和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孙晋, 2021)。另外,数据要素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其边际成本接近零、网络效应显著,基于广阔的用户基础和产量规模,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拥有规模经济优势,这将有助于其谋取超额利润、巩固市场地位(Begenau et al., 2018)。对全社会而言,这种要素垄断现象还可能对消费者福利水平产生影响(王世强, 2021),从而有损于收入分配公平。

结合我国数字化的现有研究和发展现状,在总体富裕层面,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更高效的生产管理方式,同时推动相关产业链创新升级,无论是对企业自身成长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在公平共享层面,随着数字化变革平稳度过探索期并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转型初期的就业失配问题有所缓解,就业创造效应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将有助于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但在行业内部,由于我国属于数字化后发国家,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数字经济中垄断现象不断出现,头部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业绩和薪酬差距不断扩大,企业间收入分配公平性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H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整体共同富裕具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内收入分配上,而企业间收入分配公平则会受到负向影响。

(三)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共同富裕的异质性表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会因企业劳动技能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差异。首先,从技能工资的视角看,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影响为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即替代部分中低技能劳动岗位,同时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这种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会推升技能工资溢价,且推升效果在劳动技

能水平较高的企业更为明显(杨飞, 2017)。其次, 从分享利润的角度看, 在实际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形下, 高盈利企业的员工往往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作为自身努力的前提, 而雇主为了企业自身发展也愿意将利润与员工共享(周申、海鹏, 2020)。数字化转型使得生产过程更加依赖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系统, 对劳动者的信息技术能力和数字素养提出了一定要求, 这种门槛的存在会导致不同企业间的营收增长出现差距, 进而传导至收入分配层面。具体而言, 技术条件先进、劳动技能水平高的企业大概率将获得更显著的生产率提升, 从而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 反之技术条件落后、数字化推进受限的企业则处于劣势地位。此外, 高技能结构水平企业往往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更高的风险承担阈值, 这同样有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黎文靖、郑曼妮, 2016)。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 H2: 相对于低劳动技能水平企业, 数字化转型会对高劳动技能水平企业的共同富裕程度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应聚焦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差异。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融资约束程度的中介效应(吴非等, 2021), 而忽略了企业间初始融资禀赋的异质性影响。对单个企业来说, 高融资约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扩张和创新能力, 使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投入新兴数字技术中, 而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也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意愿, 这些都可能导致企业无法充分获取数字化改造红利, 从而限制了生产率提升和绩效增长, 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Howell, 2017)。另外, 高融资约束往往意味着企业面临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水平, 对管理者的战略决策会产生一定干扰, 从而对企业的创新驱动造成负面影响。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H3: 相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企业, 数字化转型会对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共同富裕程度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也不能忽视企业规模的差异。首先, 大企业能够借助品牌等优势实现规模效应, 降低市场推广成本, 从而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其次, 数字技术变革具有一定的门槛, 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也需要较长时间, 致使一般中小企业难以独自承担转型带来的成本与风险(池仁勇等, 2020)。相比而言, 大企业资金雄厚, 抗风险能力更强, 研发创新优势明显, 因此对数字化转型红利充分挖掘的可能性也更大(唐曼萍、李后建, 2019)。进一步地, 研发投入增加使得企业能够更多地吸纳高素质人才, 从而形成广泛的外部创新网络,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Noori et al., 2017)。上述理论与著名的“熊彼特假说”相契合, 但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 认为大型企业的官僚体制和生产过程的路径依赖会对技术变革产生抑制作用。此外, 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形成市场势力, 从而因缺乏竞争压力陷入“能力陷阱”, 这也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Liu, 2006)。由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相关技术还尚未出现固化, 因而本文认为企业规模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 并据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 H4: 相对于小规模企业, 数字化转型会对大规模企业的共同富裕程度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本部分首先构建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回归模型, 随后是介绍数据来源、主要变量

的构建方法及描述性统计。

(一) 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1) 设定如下:

$$CP_{i,t} = \beta_1 Digit_{i,t} + \sum_{j=1}^n \phi_j Control_{i,j,t} + Year_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CP_{i,t}$ 代表在 t 期企业 i 的共同富裕程度。 $Digit_{i,t}$ 代表在 t 期企业 i 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Control_{i,j,t}$ 代表在 t 期企业 i 第 j 个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回报率($ROA_{i,t}$)、企业经营现金流($CF_{i,t}$)、企业总资产增速($Assgrw_{i,t}$)、企业成立年限($Age_{i,t}$)、企业负债率($Lev_{i,t}$) 和企业产权($SOE_{i,t}$)。 $Year_t$ 为年度虚拟变量, 用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 α_i 为控制企业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11—2020年的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关键变量缺失的公司样本被排除在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在1%和99%分位处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三) 变量构建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共同富裕程度。对企业共同富裕程度的衡量, 本文直接采用了国泰安数据库中的综合数据, 该数据包含员工就业、员工薪酬、员工保障、顾客共享、股东共享、其他合作伙伴共享、良性竞争、税收贡献、公益慈善等九大一级指标, 本文根据这九大一级指标的得分计算出平均值¹, 以此作为企业共同富裕程度的指标, 其数字越大代表企业共同富裕程度越高。

为了区分出企业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个维度, 本文将企业共同富裕九大一级指标所有二级指标分为两类。“做大蛋糕”维度主要包括员工就业、员工薪酬、员工保险、公司业绩、公司分红、公司相关者利益等17个二级指标²; 而“分好蛋糕”维度主要包括弱势群体关爱、薪酬差距、安全生产、消费者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税收贡献、公益慈善等16个二级指标³。由于二级指标较多且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 来实现数据降维, 并提取出第一主成分作为企业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程度指标和“分好蛋糕”程度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本文采用了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该指数根据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化成果、数字化应用等六个核心指标得分加权计算得出, 其涵盖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比较全面。后文还将采用其他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

3.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层面的指标, 主要包括企业资产回报率(ROA)、企业经营现金流(CF)、企业总资产增速($Assgrw$)、企业成立年限(Age)、企业负债率(Lev) 和企业产权(SOE)。由于共线性问题, 未加入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

4. 异质性变量: 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共同富裕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分别以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人数占比、融资约束 WW 指数⁴、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作为企业劳动技能水平、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行业垄断程度对同行业内企业间共同富裕程度的影响, 本文以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行业垄断程度的指标。本文主要变量测量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算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共同富裕程度	<i>CP</i>	根据员工就业、员工薪酬、员工保障、顾客共享、股东共享、其他合作伙伴共享、良性竞争、税收贡献、公益慈善九项评分平均计算得出
	“做大蛋糕”程度指标	<i>CP_1</i>	根据员工就业、员工薪酬、员工保险、公司业绩、公司分红、公司相关者利益等 17 个二级指标计算得出
	“分好蛋糕”程度指标	<i>CP_2</i>	根据弱势群体关爱、薪酬差距、安全生产、消费者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税收贡献、公益慈善等 16 个二级指标计算得出
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i>Digit</i>	根据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化成果、数字化应用等六个核心指标加权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	企业资产回报率	<i>ROA</i>	税后净利润 / 企业总资产
	企业经营现金流	<i>CF</i>	现金流量净额 / 企业期初总资产
	企业总资产增速	<i>Assgrw</i>	企业总资产的同比增速
	企业成立年限	<i>Age</i>	观测年度 - 企业成立年度
	企业负债率	<i>Lev</i>	企业总负债 / 企业总资产
	企业产权性质	<i>SOE</i>	国有企业设为 1，非国有企业设为 0
异质性变量	赫芬达尔指数	<i>HHI</i>	行业内的每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的比值的平方和
	企业员工受教育水平	<i>Edu</i>	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 / 总员工数量 × 100
	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i>WW</i>	参考 Whited & Wu (2006)，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 <i>WW</i> 指数，并经过标准差处理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四)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根据表 2 的结果，本文所使用的各变量不存在极端值，且变量分布较为合理，符合做回归分析的条件。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P</i>	28113	4.54	0.38	3.58	5.56
<i>CP_1</i>	28113	-0.01	1.35	-2.95	3.49
<i>CP_2</i>	28113	-0.01	1.22	-2.53	3.08
<i>Digit</i>	28113	3.54	0.27	3.14	4.19
<i>ROA</i>	28113	0.03	0.08	-0.72	0.24
<i>CF</i>	28113	0.02	0.13	-0.35	1.68
<i>Assgrw</i>	28113	0.19	0.5	-0.48	6.33
<i>Age</i>	28113	18.09	5.75	3.25	35.5
<i>Lev</i>	28113	0.44	0.22	0.03	1.53
<i>SOE</i>	28113	0.36	0.48	0	1
<i>HHI</i>	24047	0.15	0.17	0.01	1.00
<i>Edu</i>	20154	4.63	5.8	0.08	38.43
<i>WW</i>	28089	-0.70	0.08	-0.99	-0.41
<i>Size</i>	28113	22.17	1.32	18.7	27.30

四、实证检验

(一)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总体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模型(1)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共同富裕程度、“做大蛋糕”程度和“分好蛋糕”程度的影响，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为企业共同富裕程度的回归结果，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总体共同富裕。列(2)为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构建的企业共同富裕程度的回归结果，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果比较稳健。列(3)、列(4)分别为使用“做大蛋糕”程度指标和“分好蛋糕”程度指标的回归结果，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显著提升“做大蛋糕”程度，还有助于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即“分好蛋糕”。以上实证结果支持本文假设 H1。

2. 数字化转型对同行业内企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不仅作用于企业内收入分配差距,而且还会对企业的行业地位和垄断水平产生影响,即作用于同行业内企业间收入分配。在低边际成本、规模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下,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应用会引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反过来强化头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参考陈胜蓝、刘晓玲(2018)的研究方法,本文以行业垄断程度为代理变量,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行业垄断的影响,并检验了行业垄断程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影响共同富裕程度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列(1)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行业赫芬达尔指数越高,即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参考罗宏等(2023)以及岳树民、肖春明(2023)的做法,本文根据各行业每年的赫芬达尔指数将样本分为低、中和高三个组别,表4中列(2)、列(3)

分别显示了低赫芬达尔指数组和高赫芬达尔指数组的实证结果,对于赫芬达尔指数较高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对于赫芬达尔指数较低组,其回归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行业垄断程度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对其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进而提高行业内各企业间的不平等程度。以上实证结果表明,本文假设H1成立。

3.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不同内涵维度可能具有差异化影响。基于共同富裕的指标定义,我们将

表3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内收入分配的回归结果

	(1)	(2)	(3)	(4)
	总体共同富裕指标	总体共同富裕指标 - PCA	“做大蛋糕”程度指标	“分好蛋糕”程度指标
$Digit_{i,t}$	0.0488*** (2.779)	0.2199*** (4.216)	0.2713*** (4.623)	0.2117*** (2.895)
$ROA_{i,t}$	0.5205*** (17.936)	1.2154*** (15.557)	3.3117*** (29.916)	2.2440*** (17.708)
$Assgrw_{i,t}$	0.0482*** (13.364)	0.1474*** (13.154)	0.2981*** (18.479)	0.1894*** (11.840)
$Lev_{i,t}$	0.1393*** (7.079)	0.6397*** (10.507)	1.0799*** (13.644)	0.6764*** (8.182)
$Age_{i,t}$	0.0242 (0.668)	0.0237 (0.258)	0.0922 (0.883)	-0.1523 (-1.228)
$CF_{i,t}$	-0.0059 (-0.523)	-0.0725** (-2.200)	-0.2190*** (-5.257)	0.0387 (0.863)
$SOE_{i,t}$	-0.0373** (-2.494)	-0.0345 (-0.768)	0.0126 (0.192)	-0.1154* (-1.848)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8113	28113	28113	28113
Within R^2	0.504	0.646	0.532	0.18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后的稳健 t 值,下同。

表4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间收入分配的回归结果

	(1)	(2)	(3)
	赫芬达尔指数	低赫芬达尔指数组	高赫芬达尔指数组
$Digit_{i,t}$	0.0451*** (3.960)	0.0362 (1.123)	0.0574* (1.768)
$ROA_{i,t}$	-0.0915*** (-3.792)	0.7136*** (9.829)	0.4183*** (8.556)
$Assgrw_{i,t}$	-0.0003 (-0.142)	0.0375*** (5.293)	0.0458*** (6.927)
$Lev_{i,t}$	-0.0208* (-1.649)	0.1729*** (4.767)	0.0548 (1.427)
$Age_{i,t}$	0.0402 (1.540)	0.0495 (0.742)	0.0391 (0.629)
$CF_{i,t}$	-0.0036 (-0.617)	-0.0253 (-1.220)	-0.0089 (-0.442)
$SOE_{i,t}$	0.0040 (0.505)	-0.0239 (-0.748)	-0.0060 (-0.208)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24047	8026	7973
Within R^2	0.021	0.556	0.529

表 5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不同成分影响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员工方面 (初次分配)	税收方面 (二次分配)	慈善方面 (三次分配)	共享方面	行业竞争方面
$Digit_{i,t}$	0.0376*** (4.382)	0.0237** (2.416)	0.0049* (1.918)	-0.0107 (-1.128)	-0.0043 (-1.303)
$ROA_{i,t}$	0.0752*** (6.362)	0.2942*** (18.364)	0.0023 (0.696)	0.1397*** (9.848)	0.0150** (1.983)
$Assgrw_{i,t}$	0.0257*** (12.022)	0.0242*** (11.617)	0.0019*** (2.911)	-0.0044** (-2.288)	0.0019*** (3.139)
$Lev_{i,t}$	0.0887*** (8.711)	0.1009*** (9.349)	-0.0139*** (-5.975)	-0.0351*** (-3.567)	-0.0004 (-0.130)
$Age_{i,t}$	0.0168 (0.966)	-0.0191 (-1.112)	-0.0012 (-0.187)	0.0210 (0.921)	0.0062 (1.406)
$CF_{i,t}$	-0.0307*** (-5.604)	0.0074 (1.242)	-0.0045** (-2.417)	0.0230*** (3.660)	-0.0006 (-0.217)
$SOE_{i,t}$	0.0066 (0.830)	-0.0111 (-1.336)	-0.0035* (-1.901)	-0.0314*** (-3.717)	0.0015 (0.704)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8113	28113	28113	28113	28113
Within R^2	0.088	0.107	0.973	0.221	0.004

共同富裕拆分为五方面内容：员工方面(初次分配)、税收方面(二次分配)、慈善方面(三次分配)、共享方面和行业竞争方面⁵，分别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它们的影响。在对企业层面的变量进行控制后，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中员工、税收和慈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两方面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初次分配(员工方面)、二次分配(税收方面)和三次分配(慈善方面)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其中初次分配(员工方面)和二次分配(税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结果；而共享和行业竞争则主要与宏观政策、全行业发展水平等有关，因此数字化转型很难对其产生影响。

(二)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分析

1. 企业劳动技能水平

为了验证企业劳动技能水平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根据每年企业劳动技能水平将样本分为低、中和高三组，其中低技能水平组和高技能水平组的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1)、列(2)所示。结果表明，对于高劳动技能水平企业而言，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低劳动技能水平企业的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企业劳动技能水平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强，数字化转型会对不同劳动技能水平企业的共同富裕水平产生异质性的影响。以上实证结果证明本文假设H2成立。

2. 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而不同融资水平的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和转型效果会产生很大影响。为检验企业融资约束是否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本文根据每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指标将样本分为低、中、高三组，低融资约束程度组和高融资约束程度组的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3)、列(4)所示。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水平

表6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异质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低劳动技能水平	高劳动技能水平	低融资约束程度	高融资约束程度	小企业规模	大企业规模
$Digit_{i,t}$	0.0015 (0.049)	0.0533* (1.685)	0.0591** (2.176)	-0.0158 (-0.575)	-0.0026 (-0.417)	0.0157** (2.463)
$ROA_{i,t}$	0.4632*** (8.640)	0.4450*** (10.095)	1.7814*** (15.262)	0.0910*** (3.178)	0.0521*** (6.310)	0.2165*** (10.921)
$Assgrw_{i,t}$	0.0429*** (5.969)	0.0319*** (5.146)	0.0219*** (4.064)	0.0317*** (3.169)	0.0118*** (5.813)	0.0060*** (5.377)
$Lev_{i,t}$	0.0590 (1.591)	0.1221*** (3.122)	0.2763*** (5.634)	0.0952*** (3.730)	0.0123* (1.935)	0.0427*** (3.851)
$Age_{i,t}$	-0.0776 (-0.823)	0.1040 (1.643)	0.0019 (0.047)	-0.0648 (-0.753)	-0.0032 (-0.188)	0.0091 (0.815)
$CF_{i,t}$	-0.0051 (-0.224)	0.0241 (1.252)	-0.0151 (-0.676)	0.0016 (0.083)	-0.0011 (-0.288)	-0.0005 (-0.082)
$SOE_{i,t}$	-0.0379* (-1.866)	-0.0585* (-1.814)	-0.0351 (-1.449)	-0.0271 (-1.212)	-0.0114** (-2.484)	-0.0087 (-1.385)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8723	8716	9367	9359	9374	9367
Within R^2	0.457	0.521	0.617	0.485	0.440	0.574

下显著为正，而高融资约束程度组的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越强，这可能是因为高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而使得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说明本文假设H3成立。

3. 企业规模

现有文献已经证明数据要素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那么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企业的实际效果可能更强，从而对共同富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验证上述猜想，本文根据每年企业规模将样本分为小、中、大三组，小规模企业组和大规模企业组的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5)、列(6)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大规模企业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小规模企业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强，这也证明了本文假设H4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从模型内生性问题、改变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等角度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

(一) 模型内生性问题

为解决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曾庆生等(2018)的做法，将同年份同省市除企业自身外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Digit_IV_{i,t}$ ，并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中列(1)、列(2)。根据列(1)、列(2)的检验结果可得，工具变量 $Digit_IV_{i,t}$ 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它对解释变量 $Digit_{i,t}$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为13.272，它对应的P检验值是0.0003，即拒绝不可识别假设，这说明模型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模型在第一阶段的F统计量为13.26，对应的P检验值是0.0003，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是17.299，大于Stock-Yogo弱工

表 7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3)	(4)
	<i>Digit</i> (第一阶段)	<i>CP</i> (第二阶段)	<i>Digit2</i>	<i>Digit3</i>
<i>Digit_IV_{it}</i>	0.1639*** (3.6416)			
<i>Digit_{it}</i>		1.6448*** (2.647)	0.0079*** (2.754)	0.0181*** (6.370)
<i>ROA_{it}</i>	-0.0011 (-0.0942)	0.5209*** (17.577)	0.4482*** (13.157)	0.5226*** (18.117)
<i>Assgrw_{it}</i>	0.0060*** (3.1594)	0.0386*** (6.422)	0.0413*** (8.686)	0.0461*** (12.425)
<i>Lev_{it}</i>	0.0225*** (2.9910)	0.1013*** (4.455)	0.1280*** (4.970)	0.1346*** (6.833)
<i>Age_{it}</i>	-0.0293** (-2.0088)	0.0699* (1.832)	0.0540 (1.072)	0.0180 (0.509)
<i>CF_{it}</i>	0.0070 (1.1416)	-0.0166 (-1.068)	-0.0035 (-0.227)	-0.0025 (-0.219)
<i>SOE_{it}</i>	0.0034 (0.5751)	-0.0419*** (-3.059)	-0.0200 (-1.149)	-0.0408*** (-2.687)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13.26			
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		13.272 [0.0003]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7.299		
样本数	27978	27978	17373	27267
<i>Within R²</i>		0.156	0.491	0.532

具检验所要求的 10% 偏误临界值(16.38)，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Digit_{it}$ 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解释系数为 0 的原假设，且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二) 改变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

前文用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指标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为了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在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后，再次进行基准回归。替换后的代理变量如下：

1. 参考吴非(2021)的计算方法，该方法的词频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等五个维度的 76 个数字化关键词。

2. 参考赵宸宇等(2021)的计算方法，该方法的词频包括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等四个维度的 99 个数字化关键词。

改变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如表 7 中列(3)、列(4)所示。根据结果，在替换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后， $Digit_{it}$ 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前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也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使用 2011—2020 年中国深沪 A 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深入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总体上是正向的,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层面,而企业间收入分配则会因行业垄断程度加深受到负向影响;第二,对于共同富裕的不同内涵维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细化影响存在差异;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能水平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影响更为显著。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模型内生性以及改变数字化转型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根据本文核心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具体而言,首先,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度,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其次,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或提供税收减免等,鼓励企业运用数字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业绩,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此外,还要注重引导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确保数字化红利能够惠及全体员工。

第二,加强行业垄断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企业数字化转型虽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其潜在的行业垄断效应可能导致企业间收入分配不均,进而加剧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为应对这一问题,政府要加强对行业垄断风险的监管与预防,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框架。具体举措包括建立相关监管机制,密切关注大型数字化企业的市场行为,防止其利用技术优势排挤中小企业,同时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力,确保市场的多元和健康发展。此外,政府还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防止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扩大企业间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三,实施差异化扶持战略,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变革。基于异质性分析结果,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考虑不同企业的发展阶段和类型特点,以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首先,应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与储备,通过校企合作、技能培训等方式,解决部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为数字化技术的持续应用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其次,针对企业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建议政府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供低息贷款、数字化转型专项贷款等金融支持,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最后,对于头部大企业,政府应引导其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兼顾社会责任,同时将这些企业的数字化经验向中小企业推广,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推动行业内技术扩散和数字化进程的整体进步。■

(责任编辑:韩娟)

注释:

¹ 为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来实现数据降维,并提取出第一主成分作为企业总体共同富裕指标,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

² “做大蛋糕”维度17个二级指标包括年终员工数、新增就业岗位、职位竞争力与职业生涯管理、每股薪酬贡献、雇员利润分享、人均薪酬、员工薪酬增长率、职业健康保障、雇员社会保障基金缴付比例、商业保险、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现金分红、供应商权益保障、分销商权益保障、每股债息贡献、债权人权益保障、竞争者合作/联盟。

³ “分好蛋糕”维度16个二级指标包括管理层性别多样性、弱势群体关爱、董监高和其他员工平均薪酬比、合法用工、安全生产投入、安全生产水平、员工权益保护、产品/服务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保护、社区生态环境保护、公平竞争/不正当竞争、

每股税收贡献、人均所得税、依法纳税、社会捐赠,另有产品召回数量、扶贫投入、资助贫困学生人数、扶贫及乡村振兴投入等4个二级指标因为数据缺失较多未被使用。

⁴ 参考Whited & Wu(2006),本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的公式如下: $WW=-0.091*CF-0.062*Div+0.021*Lev-0.044*Size+0.102*ISG-0.035*SG$,其中, WW 是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CF 是企业经营现金流, Div 是企业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虚拟变量(发放现金股利设为1,否则设为0), Lev 是企业负债率, $Size$ 是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ISG 是行业平均销售增长率, SG 是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⁵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的统计指标,初次分配包括员工就业、员工薪酬和员工保障指标,二次分配包括税收贡献指标,三次分配包括公益慈善指标,共享包括顾客共享、股东共享和其他合作伙伴共享指标,行业竞争包括良性竞争指标。

参考文献:

- [1]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 [2]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管理世界,2022,38(1):52-62,76.
- [3]杨德明,刘泳文.“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中国工业经济,2018(5):80-98.
- [4]Ebert C,Duarte C H C.Digital Transformation[J].IEEE Softw.,2018,35(4):16-21.
- [5]胡青.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与绩效[J].浙江学刊,2020(2):146-154.
- [6]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0,130-144.
- [7]孙继国,许玉兰.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运营成本与运营效率的视角[J].农村金融研究,2023(12):20-30.
- [8]方明月,林佳妮,聂辉华.数字化转型是否促进了企业内共同富裕?——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11):50-70.
- [9]Acemoglu D,Restrepo P.Automation and New Tasks: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9,33(2):3-30.
- [10]徐朝辉,王满四.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2(9):108-119.
- [11]李树,王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收入不平等[J].产业经济评论,2023(1):81-104.
- [12]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 [13]万广华,蓝菁,刘震.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J].经济科学,2023(2):5-25.
- [14]陈宗胜,杨希雷.论中国共同富裕测度指标和阶段性进展程度[J].经济研究,2023,58(9):79-97.
- [15]曾之明,罗浩峰,陈泳江.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机制与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23(9):38-52.
- [16]裴璇,陆岷峰,王稳华.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4):3-22.
- [17]Guellec D,Paunov C.Digital Innov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NBER Working Paper,2017(w23987).
- [18]夏杰长,刘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9):3-13.
- [19]Gölzer P,Fritzsche A.Data-Driven Operations Management:Organis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Industrial Practice[J].Production Planning & Control,2017,28(16):1332-1343.
- [20]戚聿东,蔡呈伟.数字化企业的性质:经济学解释[J].财经问题研究,2019(5):121-129.
- [21]Acemoglu D,Restrepo P.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Factor Shares,and Employ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6):1488-1542.
- [22]孟浩,张美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需求?——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5):65-73,93.
- [23]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6):135-152,250.
- [24]王晓君,付文林.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行业内薪酬差距吗?——基于技术外溢程度的中介效应[J].社会科学战线,2020(4):246-252.
- [25]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J].中国社会科学,2021(5):101-127,206-207.
- [26]Begenau J,Farboodi M,Veldkamp L.Big Data in Finance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Firm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8(97):71-87.
- [27]王世强.数字经济中的反垄断:企业行为与政府监管[J].经济学家,2021(4):91-101.
- [28]杨飞.市场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J].世界经济,2017,40(2):78-100.
- [29]周申,海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J].财贸经济,2020,41(12):147-162.
- [30]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 [31]Howell S T.Financing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R&D Gran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4):1136-1164.

- [32]池仁勇, 於珺, 阮鸿鹏. 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信用环境与知识存量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20, 34(9): 43-54.
- [33]唐曼萍, 李后建. 企业规模、最低工资与研发投入[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9, 31(1): 44-55.
- [34]Noori J, Nasrabadi M B, Yazdi N, et al.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Iranian Knowledge-Based Firms: Large Firms or SME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122): 179-185.
- [35]Liu W. Knowledge Exploitation, Knowledge Exploration, and Competency Trap [J]. 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2006, 13(3): 144-161.
- [36]Whited T M, Wu G. Financial Constraints Risk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6, 19(2): 531-559.
- [37]陈胜蓝, 刘晓玲.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商业信用供给[J]. 金融研究, 2018(5): 172-190.
- [38]罗宏, 黄婉, 王治.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粘性[J]. 会计研究, 2023(2): 149-162.
- [39]岳树民, 肖春明. 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证据[J]. 财贸经济, 2023, 44(1): 51-67.
- [40]曾庆生, 周波, 张程, 等. 年报语调与内部人交易: “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 [J]. 管理世界, 2018, 34(9): 143-160.
- [41]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21, 42(7): 114-129.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HAO Da-peng LIU Wen-jin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s one of the key drivers for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icroeconomic entitie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s from 2011 to 2020,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mechanis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overall common prosperity, primarily through improving the intern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ithin enterprises, that 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making the cake bigger" but also helping to "divide the cake better". However, si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y exacerbate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monopolization, it may negatively affect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enterprises. Additionally, the nuanced effect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ffer across various stag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skilled enterprises, those with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large-scale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 solid manner.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mon Prosperity; Labor Skill Level; Financing Constraint; Enterprise Scale